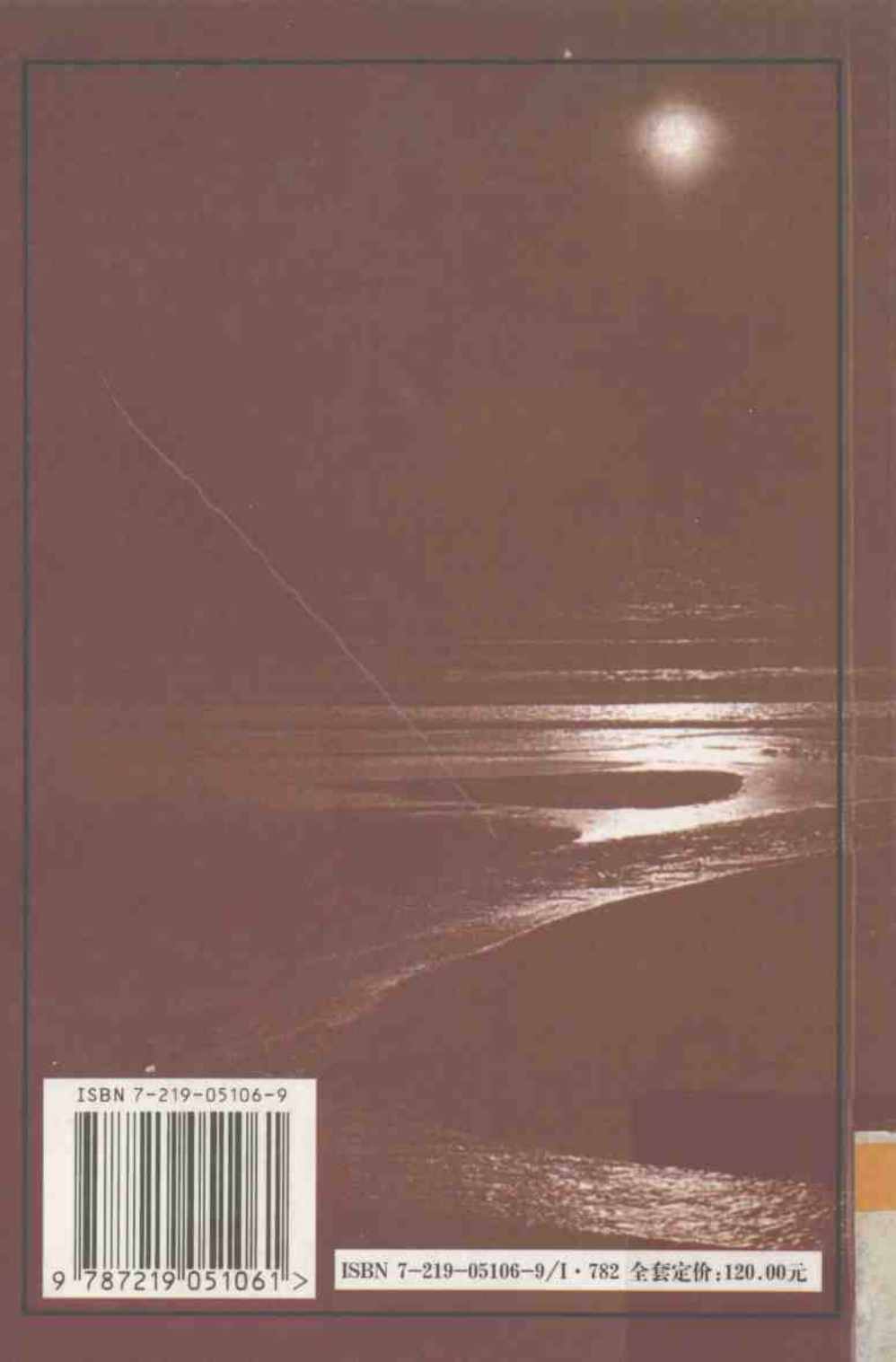


南方论丛 / 张燕玲 张萍主编

两岸诗人论

陈祖君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ISBN 7-219-05106-9



9 787219 051061 >

ISBN 7-219-05106-9/1 · 782 全套定价:120.00元

南方论丛 张燕玲 张萍主编

两岸诗人论

陈祖君 著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南方论丛/张燕玲, 张萍主编.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4. 9

ISBN 7-219-05106-9

I. 南... II. ①张... ②张... III. 美学—文集
IV. B8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3128 号

责任编辑 白竹林

责任校对 彭青梅

南方论丛

两岸诗人论

陈祖君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 530028)

南宁市桂春路 6 号)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32

115 印张 2000 千字

南宁大板彩印有限责任

公司印刷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19-05106-9/I·782 全套定价: 120.00 元



陈祖君，广西忻城人，壮族，生于1966年11月。1985年考入广西民族学院中文系，1994-1995年就读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进修班。1986年开始发表诗歌，著有诗集《月亮笔记》（1994）。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陆续在海内外发表诗学论文及汉语讲人。作家的研究专著，计60余万字。著有《中国当代文学史》（合著）。2004年获广西第八次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现任广西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华文诗歌研究所副所长。

广西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

资助出版 (编号 02020104)

目 录

绪论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发展的三大阶段与两大板块	1
--------------------------------	---

上编 内地诗人

第一章 现代主义诗人 1949 ~ 1966 的潜在写作	15
一 困境与冲突	15
二 “颂歌”与“战歌”之下的潜在写作	20
第二章 忧郁的诗神——后期艾青论	33
一 “前进道路上的危机”	33
二 夹缝里的徘徊与“忧郁”	36
三 “归来的歌”并未“归来”	41
第三章 金币的两面——绿原论	50
一 金币的正面：“童话”	50
二 金币的负面：“重读”与“拾穗”	62
第四章 昆仑摩崖，无韵之诗——昌耀论	68
一 “无可回归”之路	68
二 “混血”与“还乡”	87

第五章	崛起的诗群——朦胧诗人论	103
一	诗学上的暴动	103
二	英雄挽歌：北岛	110
三	女性觉醒与道德承诺：舒婷	118
四	美的恐惧和“偏执”的恐怖：顾城	128
第六章	平面叙事与民间立场——第三代诗人论	143
一	断裂的诗学	143
二	拒绝隐喻：于坚	170
三	从语感到民间：韩东	183
四	回到身体：伊沙	196
第七章	南方的声音——九十年代两广诗人论	207
一	南方诗歌：钩沉与定位	207
二	从图腾到广场：杨克	214
三	触摸心脏岛：蓝杉	223
四	思想里的风：谭延桐	233
五	忧伤、戏谑、玄思：刘春	243

下编 台湾地区诗人

第八章	台湾地区现代诗的黄金时代	257
一	现代主义诗歌运动	257
二	“乡愁”与“都市”	264
第九章	自我的写照——纪弦论	275
一	现代诗的传火人：曳着脐带独步的狼	275

二	乐观的“气质决定风格，其人决定其诗”论	278
三	从“摘星的少年”到“晚景”：诗的自叙传	285
第十章	左手的缪斯——余光中论	296
一	“谁是大诗人？”	296
二	“左手的缪斯”	304
三	“普遍性”与“流行”	308
第十一章	从“石室之死亡”到“天涯美学”——洛夫论 ..	314
一	关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314
二	从“铁屋里的呐喊”到“石室之死亡”的宣告 ..	317
三	“诗魔”的蜕变：东方禅思与“天涯美学”	331
第十二章	深渊里的回望——痖弦论	354
一	深渊里的回望	354
二	戏剧诗人	368
第十三章	用脚思想——商禽论	388
一	梦或者黎明：他的“籍贯”	388
二	摇滚：“用脚思想”	392
第十四章	诗人小说家的逍遥与拯救——辛郁论	403
一	“逍遥”与“拯救”	407
二	“局外人”与“边缘人”	411
三	“偏爱”与“偏憎”	415
四	“新民”与“亲民”	419
主要参考书目		424
后记		430

绪论 二十世纪中国现代诗发展的 三大阶段与两大板块

中国的现代主义诗歌，是与中国新文学、新诗同步发生的，它是在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冲击下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从1917年1月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所提“八不主义”及《尝试集》所作的诗歌尝试，便可看出新文学、新诗的草创与外国文学思潮有着直接的关联。1910年胡适到美国留学，而美国的意象主义运动恰在这一年正式开始，胡适对当时具有意象主义特征的诗人尤为关注。1913年，F. S. 弗林特和埃兹拉·庞德分别发表了《意象主义》和《意象主义者的几“不”》；1914年，《意象主义者》诗集开始行世。庞德的《〈意象主义诗人（1915）〉序》发表之后，胡适甚至把它剪下贴在自己的日记本中，觉得它跟自己的主张“多相似之处”^①。1916年，胡适的“八不主义”形成，而这一年他也开始了《尝试集》的创作。朱自清先生早年就曾谈到过胡适的“历史进化眼光”、“八不主义”及“美国影象派（或译形象主义幻象派）的影响”^②。以下分别是胡适“八不主义”与庞德提出的六条原则，我们不难看出二者的相似之处：

胡适“八不主义”：（1）须言之有物。（2）不模仿古人。（3）须讲求文法。（4）不作无病之呻吟。（5）务去滥调套语。（6）不用典。（7）不讲对仗。（8）不避俗语俗字。庞德《〈意象主义诗人（1915）〉序》中的六条原则是：（1）运

用日常会话的语言，但要使用精确的词，不是几乎精确的词，更不是仅仅是装饰性的词。(2)创造新的节奏——作为新的情绪的表达——不要去模仿老的节奏，老的节奏只是老的情绪的回响。(3)在题材选择上允许绝对的自由。(4)呈现一个意象……我们相信诗歌应该精确地处理个别，而不是含混地处理一般，不管后者是多么辉煌和响亮。(5)写出硬朗、清晰的诗，决不要模糊的或无边无际的诗。(6)最后，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凝练是诗歌的灵魂。在《意象主义者的几“不”》及致哈莉特·芒罗的信中，庞德还谈到这样的几条：不要用多余的词，不要用不能揭示什么东西的形容词；不要用装饰或好的装饰；不能有书卷气的词，不能有套语、用滥了的话，千篇一律的老生常谈；不要沾抽象的边，语言是由具体事物组成的，在不具体的措词中作一般的表达是懒惰^③。

《尝试集》中，《鸽子》、《湖上》带有意象主义的痕迹，已人所共知；《一颗星儿》、《老鸦》甚至有些象征意味。同时期的诗人中，沈尹默的《月夜》、《落叶》，周作人的《小河》，梁宗岱的《暮》、《白莲》等作品，都具有浓烈的象征主义色彩。此外，孙玉石先生在《中国初期象征派诗人研究》中还列举了鲁迅《火的冰》、刘半农《敲冰》、周无（太玄）《黄蜂儿》、田汉《黄昏》等作品；张同道先生在《探险的风旗》中还列举了郭沫若、俞平伯等人的作品。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是与西方文学、文化的翻译同步并进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因接受异域象征主义文学潮流的冲击、借鉴西方现代主义诗歌而产生，这已是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正如张同道先生所说：“所有中国现代诗人都懂外文并通过外文同另外的国度连结在一起。”^④然而，作为中国新诗的一支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它的发展历程又是一个坎坷曲折、艰难探索的漫

长旅程，它甚至在历史进程中也并不总是表现出一种承继的连续性，反而呈现了一种时断时续的“断裂”性征。这一方面是因为各时期所由创发的外国文学背景的不同，另一方面也与中国政治、军事、文化局势密切相关。大致说来，二十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发展可分为三个阶段：

1. 发生成型阶段（1916~1948）

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发生成型阶段分为四个时期：

发生期（1916~1924） 如前所述，发生期的代表诗人有胡适、沈尹默、周作人、梁宗岱等，他们所接受的外来诗学影响主要是意象主义或曰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的一支）。但当时主要的任务是提倡白话文学，对诗歌的现代主义实验还只是小小的“尝试”。

象征期（1925~1931） 代表性的诗人是李金发、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和早期的戴望舒（以1932年《现代》创刊为界。因为《现代》之后，才形成一个“现代派诗”的时期）等。这一时期的诗人主要受法国波德莱尔、兰波、魏尔伦、马拉美等前期象征主义思潮的影响，注重诗歌“音”与“色”的经营，在理论和创作上均有大胆的突破与辉煌的建树——如“纯诗”概念的提出，《我的记忆》的出版等。

“现代”期（1932~1937） 代表性的诗人有戴望舒、卞之琳、何其芳、艾青，其他诗人还有李广田、施蛰存、路易士、徐迟、废名、林庚、金克木、陈江帆、曹葆华等。这些诗人主要从瓦雷里、果尔蒙、耶麦、福尔等法国后期象征主义诗人身上吸取养分，并开始接触叶芝、T.S. 艾略特、瑞恰慈、里尔克等人的诗歌及理论（三十年代中期，对T.S. 艾略特的译介成为一种热门。1937年赵萝蕤译完《荒原》，由上海新诗社出版；《诗与宣传》、《传统与个人才能》、《批评的功能》等

论文也于1936年10月之后陆续得以翻译发表)。这一时期,诗人们就新诗的晦涩与明朗、传统与现代、艺术性与社会功能等问题展开广泛深入的讨论,并开始了现代主义诗歌“中国化”的艺术实验,尝试把外国诗的技艺与中国现实、中国古典诗学融会,创造出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黄金时代——这一时代也给五十年代台湾的现代诗运动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火种。

成型期(1938~1948) 代表诗人是冯至、穆旦、杜运燮、郑敏、王佐良、袁可嘉等西南联大诗人群及辛笛、唐湜、陈敬容、唐祈、杭约赫等上海诗人(其中冯至二十年代便已出版《昨日之歌》,辛笛、陈敬容等人于“现代”时期便已在上海发表作品)。这一时期,奥登造访中国并在中国战场写下《战时》十四行组诗,英籍讲师威廉·燕卜苏在西南联大讲授《当代英诗》课,产生了“一个出现在中国校园中的英国现代诗人本身就是任何书本所不能代替的影响”,“使我们对于英国现代派诗和现代派诗人所推崇的17世纪英国诗剧和玄学派诗等等有了新的认识”^⑤。诗人们对叶芝、T.S.艾略特、奥登、里尔克、瓦雷里等人作品的深入理解及比三十年代更广泛的诗歌艺术实验,使中国现代主义诗歌迎来了它发展旅程中的又一个高峰。孙玉石先生道:“40年代,整个中国新诗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成熟的季节。”^⑥言“成熟”也许过早,但说四十年代中国现代诗已基本成型,或较为客观。虽然四十年代产生了《十四行集》、《穆旦诗集》、《诗四十首》、《诗集1942~1947》、《十年诗草》、《手掌集》、《童话》和《新诗杂话》、《诗的艺术》、《诗论》(朱光潜及艾青)等堪称经典的现代诗集和新诗理论集(袁可嘉关于新诗现代化的文论当时尚未结集),但它仍然处在一个寻找自我的阶段,它的汉语特色、它的中国性,直到今天也还没有完成。

2. 再生发展阶段 (1953 ~ 1985)

这一阶段的中国现代诗潮又可分为两个时期：

台湾地区现代主义诗歌运动 (1953 ~ 1969) 这一时期由纪弦创办《现代诗》开始，到《创世纪》1969年的停刊暂告一个段落。代表性的诗人除三十年代就已登上诗坛的纪弦（路易士）、覃子豪外，还有郑愁予、洛夫、痖弦、张默、商禽、辛郁、叶维廉、余光中、罗门、杨牧等现代诗社、创世纪诗社及蓝星诗社的诗人。主张“有所扬弃并发扬光大”借鉴“自波德莱尔以降一切新兴诗派之精神”^①，尤以象征主义、超现实主义的诗歌实验为重心，强调诗的世界性、知性、超现实性和纯粹性，创造了中国现代诗的一个狂飙突进时代。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除老一代诗人继续进行艺术探索外，张错、吴晟、李敏勇、罗青、苏绍连等中年诗人也极为活跃，加之一批出生于五六十年代的新一代诗人简政珍、白灵、零雨、陈义芝、渡也、陈黎、杨泽、罗智成、向阳、焦桐、夏宇、林彧、刘克襄、孙维民、陈克华、林耀德、鸿鸿、许悔之等的崛起，诗坛三世同堂，蔚为壮观，但台湾现代诗在批评与省思之后渐渐回归现实乡土，现代主义诗潮峰巅已不再。

内地朦胧诗运动 (1978 ~ 1985) 五十至七十年代中期的大陆，除了绿原、牛汉、曾卓、穆旦、黄翔等少数现代诗人在特殊环境下进行隐秘的“地下写作”之外，食指、多多、芒克、根子等“白洋淀诗派”诗人到七十年代末才因《今天》(1978年12月)的创刊而浮出水面，他们与后来被认为是“朦胧诗”代表诗人的北岛、舒婷、顾城、江河、杨炼等，共同推动了中国现代诗八十年代的“崛起”。因处在一个中国现代主义诗学传统中断了三十年的非常时代，这一时期所接受的外来文化影响较为复杂，“文革”时期“以批判为目的的内部

发行供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阅读的西方和苏联解冻时期的现代哲学、文学著作，在这批青年人手中传阅着，形成一个半狂热的秘密读书活动”^④，较重要的有萨特《辩证理性批判》，怀特《分析的时代》，爱伦堡《人·岁月·生活》，波德莱尔的诗歌和美国“垮掉的一代”的作品（凯鲁亚克《在路上》、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金斯堡《嚎叫》等）；1978年之后，部分报刊开始评价西方现代派文学，而较系统的论著和翻译，到八十年代初才陆续出版（均为选编，如柳鸣九编的《萨特研究》、袁可嘉等编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骆嘉珊编的《欧美现代派作品选》等），但直到八十年代中期，还没有关于现代派诗的专著或某个现代诗人、现代诗派的译著^⑤。所以，朦胧诗人在诗艺上并没有多少“崛起”（还未达到后期象征主义），但他们以西方现代哲学为参照，用一种浪漫主义式的理想激情呼唤一个“真诚而独特的世界，正直的世界，正义和人性的世界”^⑥，使现代诗的火种在中国内地得以复燃。

台湾地区现代主义诗潮与内地朦胧诗运动，和四十年代的现代主义诗潮并没有直接的连续性，这种断裂，从台湾现代诗人高扬三十年代诗歌大旗、内地八十年代的朦胧诗被称为“崛起”及穆旦在九十年代之后才被“重新发现”中便可明了。而内地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的朦胧诗运动，也与五六十年代的台湾地区现代诗潮处于一种隔绝的状态，相互间并没有影响、继承的痕迹。但作为中国现代主义诗潮的同一个阶段，它们的发动都具有“再生、重燃”的性质。在现代诗艺上，台湾地区现代诗人的探索或走得远些；而就诗歌的社会性而言，朦胧诗人的影响则更为广泛（这除了诗人的创作理论以外，也与诗歌语言的明朗程度有关）。中国是一个诗教之邦，诗歌的启蒙作用与教育功能是文明古国（诗国）的文化传统之一（“言

志载道”），也是新文学的传统之一（“为人生”、“人的文学”）。现代诗的中国性、中国味，绝不仅仅是中国传统风物的现代展览，而对社会的承担、对民族文化命运的承担，本来就是衡量先锋艺术、诗歌的一把标尺。没有丝毫艺术性的“非诗”和缺乏中国艺术精神的“非诗”，同样会被中国现代诗歌史所抛弃。所以，台湾地区现代主义诗潮与内地朦胧诗运动，它们虽相互隔离，两岸分发，但带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却是一种创痛般的深层启示。

3. 转型探索阶段（1986～ ）

八十年代伊始，由于社会的转型以及世界范围的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汉语诗歌的现代主义性征渐渐向后现代主义性征转变。1986年10月《诗歌报》和《深圳青年报》的“现代诗大展”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诗歌事件，标志着祖国内地诗坛已基本完成了现代诗的转型。被称为“第三代”或“新生代”的新一代诗人是以对“朦胧诗”的反叛与超越来完成他们诗学上的最初探险的，反英雄、反崇高、反理性、反主流、反文化、反抒情等成为新一代诗人的诗学纲领。而中国台湾诗坛经过了七十年代的论战，现代诗也于八十年代中期基本完成转型。一种焦桐所谓的“反对诗学”的来临，成为其转型的明显标志。“反对诗学代表了为那些被迫害、被剥脱权利者发言的声音，它着眼于社会的边缘群体，力图超越传统政治和主流文化的范畴。这些新声音道出原住民的困境、生态环境的破坏、老荣民的生活问题、青少年问题、雏妓问题等等。进入九十年代，它所关怀的视野更加开阔，新议题如消除对同性恋的歧视，陆续浮现。”1984年，“山地人”这个带有歧视意味的旧名称正式被“原住民”所取代，被看作是“此一集体抗议意识的表征”^①。

这一“转型”期的代表性诗人有内地的于坚、韩东、伊沙和台湾地区的陈黎、夏宇、陈克华等。其外来影响较为庞杂，除“垮掉派”诗歌外，西方现代派的一些理念和技法在“处理”（多为“反学”——借用余光中先生的概念）之后仍“为我所用”；另外，存在主义（萨特、海德格尔）、结构主义（罗曼·雅克布逊、乔纳森·卡勒）、解构主义（雅克·德里达）及精神分析学（弗洛伊德）、符号学（罗兰·巴特）、知觉现象学（莫里斯·梅洛-庞蒂）、“东方学”（爱德华·W. 萨义德）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综合影响也随处可见。另一方面，就是一些有“纯诗”趋向的诗人，如西川、欧阳江河、林耀德等，他们作品中叙事成分的加重、都市特定场景的选择及俗化、琐屑化的描写，都不约而同地体现了一定的后现代主义性征。内地世纪末发生的“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的争论，在“立场”上虽互不相同，但实质上不过是后现代思潮冲击下双方精神价值“认同危机”的一次集体爆发。1986年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是这一年两岸开始通航通邮，之后再加上网络诗歌的出现，诗人们的交流日益频繁，两岸诗歌相互发生影响，在“全球化”与“民族化”的语境中渐渐出现一种“大汉语诗歌”的整合情势，海内外华语诗人为探索崭新的“中国的现代诗”，走向了又一个诗学之旅，迎向新的世纪。

由上可见，中国现代诗发展的三个阶段，主要是根据中国现代历史文化的发展阶段来划分的。现代中国是一个东西方文化碰撞、交流的中国，而中国的现代文学、现代诗本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所结的一个果实（称之为“移植”或“恶之花”，实都不为过）。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总是与对外国文学的翻译分不开，这已无须赘言。就世界各流派文学艺术思潮